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五〇）·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一八期（zk2004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亡灵祭坛】	重燃心香——初祭姑妈，再祭爸爸	邓伍文
【研究动态】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后记	田力为
【理论研究】	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四）	吴 思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亡灵祭坛】

重燃心香——初祭姑妈，再祭爸爸

• 邓伍文 •

◇ 就写他们姐弟俩的自杀

写远去的人，我有过十余篇文字。亲人，同事，接触过的长者，能写的大多写了。就剩姑妈还没写，写爸爸也没写完，笔涩，就涩在“自杀”上。

以前写爸爸邓克生，废了好几稿，惟一不废的是1998年的《有问有猜忆爸爸》（被收入《丹枫傲霜——经济学家邓克生》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简而又简地提到他曾自杀。还有好些停留嘴边的话，多围绕着自杀，噎下吧，总不甘心。而关于姑妈邓评，她孤零零地死于1967年的12月，到底是怎么死的，他杀还是自杀，没有人能说清。

由姑妈而萌动笔祭之心，是初次拜访何家栋之后，在2004年春上。那次与何老聊，带出了我的姑父和姑妈。他们也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过，算是何老的老领导、老熟人。他们同何老的境遇差不多，沾了“宣传”，挨了整，被撵出北京。我带了姑妈的遗照，何老要看，他眼睛不好，盯着看了很久，说了声“多好的人啊”。他问起，你姑妈怎么死的，身后有文章、有人写过她吗？我含着泪摇头，他不再多说了。后来我才知道，何老全家的境遇比我姑妈更惨。

那年秋天，我住院几天，打算借病房一角写爸爸和姑妈。事先从网上下载了几篇谈自杀的文章，特别是周舵的《自杀——一个案例研究》，近三万字的长文，深深同感于“流血的创口是永远不会完全愈合的”。不是新有一个“国际预防自杀日”吗？我们家蒙上“自杀”之影，正是这个日子！爸爸是1966年9月10日清晨投水自杀，被人救起的；国际卫生组织迟至2003年才将每年的9月10日作为预防自杀日。所以，我以“我们家与自杀”起笔，并告诫自己：什么都不忌讳。

下决心笔祭一回，偏偏没能写下去。又搁下了半截稿。自杀很复杂！文革以至政治运动中的自杀，更复杂。我写不下去。同一年里，姑妈唯一的孩子、我的表哥写出文章纪念他的母亲，说1979年2月，报社（姑妈生前所在单位）召开平反大会，关于死因“使用了如下措辞：‘惨遭毒打，迫害致死’，至于最后是死于自杀还是死于他杀，仍含糊其辞。”是的，多少年了，我们没等来明确的说法。记中最深刻的总是报社造反派那凶狠的眼光。

表哥不再含糊，他以母亲“性格中开朗、倔强的一面，根据她被带回西安前的思想状态，‘自杀’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而根据她性格中具有刚烈的一面，当她一回来就受到始料莫及的两派夹击，身心交瘁，对现实完全绝望之余，以一死相抗议，以一死作倾诉，也是合乎逻辑的”。表哥多年收集材料，才勾画出他妈妈最后的那段人生：

1964年8月，她……调西安，分配在西安晚报社当总支部书记兼副总编。“文革”开始后，她因来报社时间不长，日子还比较好过，仍像历次运动一样，积极带头学习，自觉检查思想，并“自信不会成为黑帮分子”。后来，文革转入“革命群众”内部两派斗争阶段，邓评被夹在当中而无法做到不偏不倚，一次因她拒绝签发冠以“革命的打砸抢万岁”通栏大标题的清样，得罪了造反的一派。从此遭到审查和批斗，“假党员”、“国民党特务”、“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一项项罪名栽到她头上，她倔强的性格复导致批斗不断升级，由报社内部到拖上大街，由文斗到武斗，多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站立不支。当听说下次要到钟楼（西安闹市区，已有多人在该处被斗死）批斗后，邓评选择了出走。她于11月19日悄悄登上了东行的列车，举目窗外，茫茫大地，哪里有她容身之地？思之再三，只有到当解放军的儿子那里也许能受到政策的保护。于是转车南下，赴皖西儿子的驻地。谁知解放军营区也不是世外桃源，“不得当防空洞”的纪律森严可畏。她在儿子处休息了一个星期，儿子的劝说使她重新鼓起了接受考验的勇气，便又搭车北上。刚到北京侄女家，西安晚报的人即找上门来，于12月7日带着她同车回西安。走时携带了她在北京买的议价油、大米和钢精锅、棉毛裤等物，表示回去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要斗就斗，要到钟楼就到钟楼。”

次日回到报社，刚进门就被拉去批斗，“畏罪潜逃，罪加一等”，批斗的火力猛增，两派轮番轰击，直至夜深。第二天又继续折磨了她一天。第三天——12月10日晨，她挣扎着伤痕累累的身子起来，到伙房买了两分钱酱油下面条。两小时后，负责看守她的青工呼救，说邓评自杀身亡，医务人员赶来抢救，业已断气。报社当即给她儿子发去急电一纸，寥寥八字，冷若冰霜：“邓评已死，快来收尸”，而在当时政治气氛下，来有何用？

他亲爱的母亲“就此草草了结，至今尸骨无存”！表哥终于直白地说：他妈妈对那个现实“完全绝望”，才以死“相抗议”“作倾诉”的，这样的“自杀”是“合乎逻辑”的。

对于姑妈的死，我们知道得太少。没有第一现场细节——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生命如何结束的？——谁都不清楚。冥冥长夜里，把不堪回想的再细想：姑妈家在城外，她在城里报社有单人宿舍，那间小屋以前我也去过，距她死，相隔仅两个多月吧。她有个小煤油炉，当时算是新产品，她何时熄灭生活之火的？她是由那小屋走上不归之路的吗？为什么没有最后的绝笔？既是清晨，酷爱整洁的她为自己做过最后的梳妆吗？……

我的记忆中，爸爸的自杀，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捱到领出最后一份工资，分作两处留下，起眼的一处钱少些，不易找到的有整一百元，摆放得平平整整。最后那顿晚餐，他照常叫阿姨做了份酸辣汤。他把遗书放在写字台正中抽屉里，没上锁，好让人一眼就看见。遗书的字也很规整，写完“撒手去遨游”还剪下了许地山的一段话，说只有天上的星辰和地下的蝼蚁会理解他。他洗了澡换了衣才出的门，留下钢笔、手表，没带一分钱，只带了一小瓶烈性酒……

爸爸离开家，到人们开始寻找他，全城布置起来找他，都在上半夜。家里是二姐通知邻居金逊和杭迪夫妇的，再叫回妈妈的。金伯伯当时是省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代表省委奔忙在文革第一线。他和爸爸是抗日根据地里一同办财经的挚友。爸爸可能发生意外，事情的严重性不但对于我们家，对于这座省会城市都是空前的：成了文革开始后江苏的第一起高干自杀。

那天我刚入睡，被叫醒时约十一点多。后来我常说，一夜之间成了狗崽子。这一夜就是1966年9月9日之夜。对于爸爸自杀的前前后后，他是否也存在对现实的“完全绝望”，乃至被救的细节，在他“幸存”的十年里，直到1976年11月底病逝，我们没人敢掏那个心窝子，让他倾吐心声。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向我说过这桩痛事。如果这么做，对于当事人是非常残酷的——“往创口上捅刀子”；但对于历史是有价值的——血和泪的历史越真实越有价值。这一点，我到今天才意识到，但早已失去机会。

爸爸被救15个月以后，他的同胞姐姐未能获救，爸爸未作过任何评说。我不曾听他吐过半个字，似乎是连叹惜之声都不愿让我们察觉。妈妈有几次向我提起，你爸爸那年自杀未遂，你姑妈连夜来电话，说大道理，要相信这，相信那，怎么能自绝呢！可她自己呢，万万想不到呀……妈妈很清楚，姑妈肯定是被打得受不了了。妈妈讲过，她自己也有过一次“畏罪潜逃”，也是受不了造反派的凌辱，躲到省军区大院，一位老首长的家里。隔了几天才重新露面，事后谎称是“奔父丧”，其实外公于一年前就去世了。

因为死者，也因为活着的人，家中几乎缄口“自杀”，三十八年恒守。表哥一篇迟到的纪念，把家族中最忌讳的“自杀”二字又重新勾起。他似乎接近于承认他母亲就是死于自杀了，虽不愿完全承认，但已为先人摆足了自杀的理由。妈妈说，应该好好写你姑妈。我说，就写他们姐弟俩的自杀。

◇ 他们怎么会“完全绝望”的

爸爸和姑妈为什么自杀，早先，我没拿它当作一个题目去搜集材料，从不敢与人讨论，长期缺乏认真思考。若重谈具体过程，按口述历史的标准，虽不致湮没，但已模糊而难以清晰；若搜一搜相连的背景，别人的悲剧，特别是熟人的悲剧，诱发他们彻底绝望，却是十分清晰的。

先说爸爸。导致他自杀最直接的原因，可以肯定的（他“幸存”后坦然承认并被其他人认可的，其余的我不敢肯定）有二条：其一是被省委确定为“批判对象”，即将公开见报，领导找谈过话（是谁谈的，怎么谈的，我不知道）；再是友人吴天石夫妇的惨死。

当时爸爸和吴天石的“官”差不多大。文革初省委《新华日报》上两批抛出的公开批判对象，大都是爸爸的熟人，我们都得叫叔叔伯伯。被抛的孙叔平伯伯，与爸爸同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省社科院的前身），两人分任所长、书记，谁是一把手，谁是二把手，我搞不清，反正由他们（加聂启坤阿姨）搭班子草创起哲学所。也是被抛的吴天石伯伯，教育厅长，爸爸去过他们家。一次专为老朋友李仲融（胡风的连襟，夫人屠阿姨在胡风事件中自杀）再婚的事，爸爸找吴伯伯商议是进是退，说明他俩有所相知。

省委就是党组织，好大的一级组织。组织上要批判你，没法躲。1952年春“打老虎”，爸爸经历过一次，以“巨贪”上了2月19日《苏北日报》的头版头条，一时间出了名的“大老虎”，诬告得活像真的——“黄包车往家里拉金条”。爸爸挺过去了，自己有没

那事，自己清楚。这一次，怎么个“运动”法，爸爸虽在看，却不知怎么挺，自己的白纸黑字，自己哪说得清。听得吴天石夫妇被活活斗死，爸爸心中有数了。

吴伯伯和李阿姨的死，不是一般意义的心灵震撼。史学工作者严肃指明：“就现有资料来看，李敬仪和吴天石是全国在文革中最早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的两个教育工作者。”（见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详情是：

工作组的撤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以及文革领导人理论上对暴力的认可，这三个因素直接导致了1966年8月大规模校园暴力的兴起。

像李敬仪吴天石这样已经被点名批判已经被工作组“揭发批判”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马上遭到暴力性“斗争”。

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拉出门去。这时，他们还穿着拖鞋。他们被架着走，吴天石脚被戳破，一路流血。他们被拉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那里已经有一个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一群干部和教师被拉到台上“斗争”。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这时李敬仪和吴天石就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身体伤害。

接着，他们又被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着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横拖着。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

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有人用麻绳把他绑起来，要把他绑在梯子上“示众”。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脚上的肉被磨光了，昏迷不醒。被“斗争”后，吴天石昏迷了两天，在8月5日死去。

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并不很老。他们在经历几小时的“斗争”后死去，可以想见受到的“斗争”的暴力摧残程度是多么严重。（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爸爸那年55岁，长年高血压。他在家听到吴天石被斗死的消息。姐姐记得，当晚爸爸独自坐在阳台上，夜很深很深了也不回屋。随后几天，他肯定还听到了许多，或许在公交车上，或许是在单位里。王友琴调查过，“吴天石夫妇被‘斗’死，在南京几乎路人皆知”。足有一个月时间，目睹“红色恐怖”继续扩展，爸爸的心越揪越紧。那阵子妈妈在工作队，不常回家，无法舒缓爸爸的心情。在铺天盖地的政治浪涛前，身为“运动对象”，百口莫辩，命运昭然：将在非人的屈辱中受尽折磨。束手就死还不如先行自我了结，无望中爸爸选择了后者。他可能是犹豫再三才鼓足勇气的。选定了，他犹能自控，悉心地料理琐事；他也眷顾，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越漫漫夜色，独步走尽昏暗的街道，怆然于郊外的河塘边，抱着酒瓶，天已微明，最后才纵身一跃……

妈妈在怀念爸爸的文章中引过爸爸的绝命诗：采石江中太白魂，我今携酒去追寻；临终一醉千愁解，何必遑遑身后名。可我从未听爸爸妈妈复述过此情节，也始终没看到过爸爸此诗的文字材料。这就是爸爸最后的情怀？我始终不敢相信。

姑妈是遭毒打后沉入绝望的。1967年时，我在姑妈家里有一百来天，9月底才离开西安回南京。那时，姑父刘子久“大叛徒”（与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同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事已满天飞了，姑妈这个昔日的党总支书记，在单位群众眼里顿时被视为敌对的一份子。如果她不掌点儿小权，或许真能超脱一点。当时的西安晚报是市委的机关报，名为晚报，实为日报，除了省报，它是西安的老二。市委已经瘫掉，这张机关报却撑着，照常

出，得对得起订户。报社远离市委大院，那边“变幻大王旗”了，这边姑妈还得在“造反派”的闹腾中“坚守”，只要不被轰走，就得每天看版子，老老实实“签字”。在那种局面下，任何一位孤立无援者，难免不被浊浪吞没，或迟或早而已。悲剧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文化革命”全面转入武斗争斗，方兴未艾。姑妈11月出走之前，8、9月里西安两派的武斗就动起了真格的。我们住城外，亲历过几次“唆、唆”的流弹乱飞，有一次流弹头落在水泥球台边，我们一群孩子正坐在台上玩，还好奇地扒出了弹头。这已是红卫兵运动高潮的一年之后。“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就要在共产党市委“大报”（区别于造反派自办的各种“小报”）当通栏，党报昔日严肃的面孔煽动起暴力，必然会把隐藏在角落里的各种野蛮行迹鼓动起来。西安晚报社里有人热衷于这样，根子其实在北京的最高层，“文革领导人理论上对暴力的认可”还在继续着，中央首长的“讲话精神”遍载于各种小报和传单。

我还依稀记得姑妈当时有过的反感，当我们面嘀咕过。她想抗，想躲，结果在“天罗地网”中一步步绝望。她到了安徽的六安，又到北京，再回西安，千里迢迢一个大三角。混乱的世道，辗转近二十天，记者出身的职业敏感，空前的暴力，大批的死人，她不会充耳不闻。就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一年前的8月5日在校园里活活被毒打致死，最高领导在天安门楼上还对当事人说“要武嘛”，紧接着平均每天四十多条冤魂，持续一个多月！（有统计，1966年8月20日至9月30日，北京被打死者是1772人。）满城的“红色恐怖”味，何曾消退，你一个“畏罪潜逃”的人赶来吸上一口，恐怖感愈加笼罩。卞仲耘“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姑妈将再次和她相遇。她们在抗战初期可能有相遇，可能会是在长沙的《观察日报》社。（关于这一点，卞阿姨的丈夫王晶垚曾给《观察日报》的老人李普打电话长谈过，我正好在李老家，在一旁听得真切。事后忍不住也和王老通电话长谈过。大家都认为有可能相遇。《观察日报》是中共湖南地下省委的机关报，当年爸爸是主要出资人，也当编辑。姑妈、李普当过该报记者。我查见过他们的发稿。以后也可以查查卞阿姨是否在《观察日报》上发过稿。她是参加了湖南省委领导下的“文抗会”，李仲融是很活跃的头头，姑妈和李普他们也参加了。）命运，这就是命运。从民族救亡的烽火，到民族浩劫的罡风，从自觉投入，到遭毒打无处躲，以至“完全绝望”，姑妈和卞仲耘，殊途同归。

听闻暴力，经受暴力，文文弱弱的知识分子必然想到死。四十年后，2007年新春，我从胡杰手中接过《我虽死去》的电视纪录片，他拍卞仲耘之死，王晶垚追述了妻子死前，已多次被打，洗澡时还说“把身子洗干净让她们打死”。我注意到，这是卞仲耘死前最后一句发自内心的话。（《我虽死去》片中林莽先生复述，他听到红卫兵逼卞仲耘他们嚎叫，“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其实，那应是在唱《牛鬼蛇神嚎歌》，它有词有谱，合乎音乐作品的范式。卞仲耘们被逼而唱，和发自心声毫不相干。）王晶垚曾建议卞仲耘躲一躲，最终回想“卞仲耘这种情况……自己也没有办法，天罗地网啊”！8月5日那个早晨，卞仲耘“抱着一种决然赴死”的信念走出家门，她已“明明知道有生命危险”，“为了保持她个人的人格尊严……她认为她是清白的”。惨剧“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当我从《我虽死去》中看到卞仲耘尸体的裸照时，第一个反映就是联想到我的姑妈，她们是同命人呀。“惨遭毒打”“伤痕累累”的姑妈，浑身上下可能也是那模样，只是没有“立此存照”。卞仲耘“把身子洗干净让她们打死”，竟一语成谶。这十余个字，如果不能刻在卞仲耘的纪念碑（王晶垚提出就建在她工作和死去的校园里）上，也应该刻在反思“革命”暴力的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也取这句话来祭悼姑妈，虽然她离卞仲耘的“让她们打死”只差一步！

在文革初期的背景下，李敬仪、吴天石、卞仲耘，以及爸爸、姑妈他们，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被党掌控着，上面比他们地位高的大官无力自保，下面普通老百姓同样没有生命、财产的保障。拿我就读的学校班级来说，任课教师前后十位，其中两位在文革中自杀，是教

地理的刘老师，和教体育的张老师。文革以后，老同学间并不为这样的死亡比例惊讶。如果放大到全市、全国，足以说明迫害人的“天罗地网”。班主任兼教语文的女老师只有26岁，成了小“三家村”，在全校被批斗多次，身上泼墨汁，头顶浇浆糊，都让人记忆犹新。留用的国民政府时代的教工，全属“牛鬼蛇神”，被关在音乐教室里，合唱《牛鬼蛇神嚎歌》，伴唱不用钢琴，而靠铜头皮带节奏的“啪、啪”声。同样也是逼着校长来领唱。王友琴笔下的校园血腥，胡杰镜头下的校园血腥，对于我来说，非但不陌生，甚至可以补充若干目睹过的细节。

总之，浩劫之下，躲不过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嘛。可什么是“牛鬼蛇神”，本身就没有身份界定；如何“横扫”，也没有政策文本，更莫说法规限制。只要你身处这个界那个界，一旦成为运动对象，运动就不会给你留希望。

◇ 追问自杀的深层原因，学会反思

躲不过去，是否就被整死，是否去自杀，还是有区别的。仅就爸爸和姑妈的老朋友们，便大不相同。“社会病态是导致这个悲惨事件的主因，但毕竟，并不是在这个病态社会中深受其害的人都走上了这条路。”（周舵谈“自杀”文）有两点值得思考：普通人为什么会自杀？革命者为什么会自杀？

作为社会学学者，周舵研究过关于自杀现象的学术著作，主要是杜尔凯姆的《自杀论》。他归纳出杜氏理论的要点，计十一项，其中涉及自杀类型的有五点，包括“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动乱型自杀”、“宿命型自杀”和“混合型自杀”。我注意到“社会自杀律通常是稳定的”的说法，而且“一定限度之内的自杀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既非病态，亦非犯罪或不道德，亦非不正常”，这应是社会学的常识。但有一种“自杀风潮”，或者说是“异常自杀增长”很可怕，因其“迅猛发展”而构成“风潮”，同时也就“确切地反映出社会病态”，由病态的社会结构导致恶果累累。进入现代社会，更多的是“利己型”和“动乱型”的自杀。

显然，爸爸可列为文革“自杀风潮”的“先锋”，姑妈也是风潮中的践行者。他们不属于“利他型自杀”。你看：“极端利他主义的传统说教又与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与阶级斗争式的社会等级划分，与阶级歧视结合在一起，使得那些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被认为是异己阶级中的社会成员甚至连利他自杀的权利也没有！在这种阶级斗争狂的社会中，对某些人（异己阶级成员）甚至不承认他们也配作利他型自杀，他们如果自杀，一定是‘抗拒思想改造’，一定是心怀不满，一定是出于‘反动阶级本性’。”当时，爸爸和姑妈确实“不配”再有“利他”之举。他们可能比较符合“动乱型自杀”中的首条，即“由于个人的习惯秩序、原有的规范、规则受到巨大扰乱（不管是意外的灾难或骤降的好运）”。引文括号里的两极不可兼得，爸爸和姑妈摊上了前者。文革的扰乱确实是巨大的，把他们原有的、习惯的一切都摧毁了。他们也可能符合“宿命型自杀”，即“由于社会或命运对他们的摧残迫害残酷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使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生的乐趣（而别人并非如此），同时又看不到丝毫改善社会处境、改善自身命运的希望，因而不得不含恨而死。若论罪魁祸首，正是丧失理性、丧失人性的阶级斗争！”这么看来，把他们视为普通的自杀者，不难得到“学术性”的解释。

可是，爸爸和姑妈又是“一二·九”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分别毁了原有的小家，走进革命队伍，建立了新的小家，就再也没离开革命大家。奇怪的是，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革命会吞吃掉自己的儿女”的事似乎特别灵验。曾接任《观察日报》总编辑的杨赓，就在19

57年以后自杀身亡，年仅42岁。李慎之临终前最后一篇文章《被革命吃掉的儿子》，怀念有“自杀”之嫌的老友李炳泉时说：

自从一七九三年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革命家维尔涅（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说过“革命会吞吃掉自己的儿女（Revolution may devour her own children）”以来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悲剧竟是愈演愈烈。法国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革命且不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吞吃掉的自己的儿女简直是指数式的增长（据初步统计，中国共产党自己杀掉的共产党员，就比中国国民党杀掉的共产党员还多好几倍）。这样的悲剧不知道是否还要继续，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终止。

李慎之本人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起初他感到被误解和冤枉，但很快就明白了：“‘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同样是“革命儿女”的爸爸和姑妈，不是也经历了误解和冤枉吗？爸爸当过“大老虎”，姑父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被抹掉，贬谪出京，他们怎么不提防革命再发展就会“吃掉自己的儿女”呢？只因为保留着党籍，党性还在约束着他们。套用李慎之的话，叫继续“心里做戏”。李慎之的好友，也是爸爸的好友黎澍痛心地说过，共产党当政以后“凡自己选择非正常死亡道路的人都因为思想处于不健康状态。……这种不健康状态大概都是政治运动的压力造成的。”他所言的思想健康，就是保持思想的活力，不间断丰富的独立思考。选择做自由的人，还是做驯服的党员，谁在思想上健康，爸爸和姑妈他们不大明白。本应该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之后，调整选择，直到血泪流干了，活下来的人才重新选择，虽迟犹不晚。可爸爸和姑妈早先都不敢做特立独行的人，他们身上原本就缺少自由主义，既没有自觉地与党若即若离的“散漫、无纪律”的自由主义，也没有近代西方那种带有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或者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妈妈不是小来一次自由主义，才少遭一回罪吗。

同样上了共产党的船，黎澍的思想境界就迥异。他和爸爸早年非常要好，当年爸爸心甘情愿把家中大把的钱拿出来办《观察日报》，开张时的总编辑就是年轻的黎澍。1949年进了北京城，黎澍很快就发现“怎么回事，竟有点像太平天国”，近距离的观察奠定了他对有了权力的“革命党”的基本认识，并以天资冰雪悟得政治运动“纯属人造环境，是用来吓唬不懂这个把戏的老实人的。一眨眼，戏完了，纸人纸马纷纷坠地，啥事没有。所以根本用不着认真对待。”（见《忆田家英》）可惜，爸爸在文革以前与黎伯伯很少来往，全不知自家党天下里还有“根本用不着认真对待”之妙。黎伯伯早就看得透透的了，不失时机地说出“上了贼船”、“卖了身进了窑子”。黎澍有三条自律，堪称“三宝”，除了“第一，不整人”外，还有：

第二，不怕挨整。怕挨整的人经常小心翼翼，处于惶恐之中，哪里还敢“创新”？不怕挨整的人，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体会到挨整不过那么回事，就再也不怕了。不怕挨整，思想自然开朗。特别是在弄清了那些以权威自居的人的思想和理论水平以后，可以无所畏惧。

第三，急事慢办。一般总是急事急办，从不多想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只争朝夕”的事多得很，其实是无事生非。当时自杀的人如果多想一个晚上，就可能放弃自杀的念头；如果多看一个月两个月，那就根本缓和下来了。在我的熟人中不止一位因为承受不住压力，或者病在家里，或者躺在医院，如果运动初起时，能硬着头皮顶住，观望十天半月，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病也不会生了。运动都是人为的，有来潮，有退潮，到退潮时就会发现全是没事找事。懂得这个道理，思过半矣。（《黎澍集外集》）

好像就是对爸爸和姑妈说的呀。以爸爸的理论底子，还能弄不清那些以权威自居的人的思想和理论水平吗？也完全可以无所畏惧嘛，“即使冒犯上帝，也要无所畏惧”；姑妈如果

也能多想一个晚上，也能多看一两个月，硬着头皮顶住；等到“完全不同”时，他们不是也可以像黎澍一样“差堪告慰”地回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心里尤其平静，深信‘天下本无事’，所以并不惊慌。”只可惜，爸爸和姑妈他们达不到。

◇ 反思“革命”，终止暴力

回到李慎之那刨根摧本的话题，我们总该问一问：“革命吞吃掉自己的儿女”的悲剧怎么会发生的呢？作为理性动物的人所发动的革命，运动目的是改变人的命运，怎么变成世上最无理性的野兽吞噬，公然动用起毁灭人的命运的手段了呢？问题还是出在“革命”上，我们所经历的历次“革命”，究竟算什么？

开始重写爸爸与姑妈以来，终于再思起“革命”。突然感觉自己很可笑，身为“革命后代”，对“革命”很无知，到今天才问起父辈们的如何“投身革命”，继而问如何“被革命吃掉”的。姑妈和爸爸是辛亥革命的同龄人，他们未出家乡长沙前，所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和革命的杂拌。虽知有国民革命，也知有共产革命，但还不至于甘冒杀头危险去追随某一革命党。世界大战后接踵的经济危机，世界思潮对资本主义取否定态度，民族危亡逐渐逼到了家门口，苏联作为新生事物的示范力仍在上升，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思潮，吸引着国内的知识分子——这一切，构成世界性的左倾风潮，一帮自幼的同伴们都“革命”了，多方影响所及，爸爸和姑妈真诚地跟进了，离家越走越远，接受共产党的理论越来越多，与共产党枪杆子队伍越跟越紧。有革命理想的召唤，革命圣地的召唤，青春热血只为民族救亡和国家兴旺，从握笔为枪到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真诚地以为这就是革命，提着脑袋参加这一武装集团，去反对另一武装集团，打了日本再打国民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革命“大获成功”。他们真心地以为，夺取政权的全部活动叫革命，建立起苏联模式的新政权的社会大变革也叫革命，以至防止复辟防止变修，“两把刀子”不能丢，都是毋庸置疑的革命事业。这样的“革命”，核心其实是谁掌权，用他们同时代人的概括，可以叫“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与姑妈熟悉的何家栋语），或者叫“以先烈的名义，把理想主义转变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与爸爸熟悉的顾准语）。

在中国，发轫于辛亥革命的革命，一开始就面临两项课题，即原有政权的统治危机与社会的制度危机，两个危机为革命酿熟条件，但革命的物质条件并未成熟，前一危机可由推翻旧王朝结束，可制度危机始终未能解决，建立新制度的必备条件全然不具备，连续动乱中也没有成熟起来。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党的“革命尚未成功”，那个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都是枪杆子出政权的花腔变调。革命不应等同于改朝换代，是要诉诸新的政治设计的。由此我想起很令人钦佩的一位湖南人，就是已故的同辈人杨小凯。他少小年纪就以“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震惊中南海，康生点了他的名，蹲过十年大牢不说，他的双亲也是“一二九一代”人，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1986年曾陪妈妈去拜访过他的父亲杨第甫老人。“八九”风波前夕，杨小凯以“这代知识分子中一位思想敏锐者的情绪和直感”，写下了对当代中国政治动乱的沉思，早于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而提出“不主张革命”，他认为“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考核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以民主为目的，而以专制为结束，这不能算成功的政治设计。……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设计都不成功，因为很多开国功臣都因他们创立的政体的致命缺陷而人头落地”。杨小凯“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他论证式地说过，在现代条件下“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并郑重告诫：“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遭遇挫折一样，所以阻止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爸爸和姑妈如果能活到世纪之交，很可能也是“两头真”，无愧于“一二九一代”们。但是，还得承认中间的大弯路。真诚不等于真知，真诚地投身革命不等于完全理解革命。革命是改变社会根本制度的政治诉求和行为举措，当旧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社会各阶层普遍产生思变的强烈要求时，革命可以体现出促成制度代谢、推进社会进步的价值。按上述观点，社会形态的转变才叫革命，并将其和造反、王朝更迭区分开来，它绝不是国家机器的翻版，必须是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变迁。还须从形式上将“革命”区分为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早先英国的“光荣革命”，近年菲律宾的所谓“微笑革命”，东欧的“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没有暴力手段，便完成了对原有社会制度作全面彻底的大变革；更有思想革命、宗教革命、产业革命、文化革命、绿色革命，等等，也都不沾暴力的边，同样带来正面效应的变革。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剧烈的社会动荡往往不可避免；表现出暴力行动，有自觉的，也有非自觉的即盲目的。在中国历史上，盲目的暴力行动最多，破坏性也最大。思想家认为“非不得已，不宜采取暴力行动。因为一旦开始采取暴力，就难以避免盲目性”（黎澍语）。正如对毆时拳打脚踢，能掌控每一下的重轻准确吗？革命崇拜“铁拳头”，指导者与追随者难免失控，重拳之下伤及无辜，“吃掉自己的儿女”似乎不足为怪。政治运动跌宕起伏的中国更是一片能“把人变成狼”的“革命热情汹涌澎湃的土地”。

革命—暴力—专制，常会循环演进。为反抗专制，不得已闹革命；想要战胜专制，双方展开“力”的大比拼，无论结局谁赢，过程就使暴力自然升级，让暴民暴君如同过着盛大节日；推翻专制的力量，谁来控制它呢？一旦成为失控的暴力，便埋下重新闹革命的种子。杨小凯这个饱受“革命”摧残的革命后代，在摸索中接受了洛克的精辟见解。按照他的描述，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这才是洞穿历史的真知灼见！“吃掉自己的儿女”的原由大概就在此间。

血干泪干，促人清醒，记取冷酷的现实经验，摒弃热烈的革命理想。大凡再有革命酝酿，可以赞同，可以反对。革命与反革命，在法律面前平等。反对革命的勇气应不亚于赞同革命时的果敢。对革命，既允许挺身投入，也应允许观望回避，甚至公然反对；运用暴力行动的“革命”决不能轻率赞同，当慎思予以节制，懂得靠法制、靠政治均势来制约暴君、酷吏及暴民。总之，理性地对待革命，可以克服盲目的暴力，减免自相残害，保全身家性命。为众“儿女”计，力避被“吃掉”，于“革命”大可若即若离也。李慎之叹惜的悲剧不能再继续，先要从认识那类“革命”来终止。

◇ 无法为文革博物馆尽力，且燃心香

李慎之说过：“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人不可胜数，其中许多都是自杀他杀，莫可究诘。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没法分清的，尤其是死者往往处于绝对隔离的条件……”我们不是老在说“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吗，巴金倡议，亿万赞成，这“望中楼阁”谁知何年月才能拔地而起。在我想象中，应有“他杀馆”和“自杀馆”，应有“鸣谢”。鸣谢对象如王晶垚在1966年8月拿起照相机，背上了“十字架”；如王友琴的寻访写作，纪实文革受难者；如胡杰拍林昭，拍卞仲耘——他们的心血辑录，铸就成果，可望成为文革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由他们，我不禁自问：我们能为文革博物馆做些什么？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文化，革命，博物馆，显然不能以文革赖以发生的话语来解读它们，不能让毒化民族思维的话语继续毒化。因此要反思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反思推翻帝制王朝以来的革命；要更新话语来回顾文革的经历，思考文革的全程；要把这种回顾与思考留下，不拘方式、载体，能用什么就用什么；留下了，就是充实于有形无形的博物馆，也就和入了民族的集体记忆。

以前我写家族先人，都会提到族谱中的“立以德为先”，姑妈和爸爸是“德”字辈，分别又名德润、德楨。老家的祠堂是否重建，族谱是否续修，我不知道。如果男女平等，但愿润姑和爸爸都进得祠堂上的族谱。那文革博物馆呢，如果真有，爸爸和姑妈能进得去吗？我无法想象。毕竟四十年过去了。

我从爸爸、姑妈的文革“自杀”写起，祭悼他们作为“革命”的罹难者，倒出自己心底的淤积，也算是重燃心香。无法为文革博物馆尽力，且寻求一种慰藉，聊以补偿。这炷心香，同时祭悼李敬仪、吴天石、卞仲耘，他们是我心中最惨的冤魂。这炷心香，还祭悼不可胜数的因“革命”运动而自杀的人，包括文中涉及到的杨庚、李仲融家的屠阿姨、黎澍写过的田家英，李慎之写过的李炳泉，杨小凯的母亲，何家栋的孩子，还有我的那两位老师。这炷心香，也还要祭悼本文中提到的所有人当中的已故者：先是黎澍、顾准、李慎之、何家栋、杨小凯，他们的思想光辉指引我无所畏惧；再是我见过的刘子久、李仲融、金逊、孙叔平、聂启坤、杨第甫、巴金，他们都是可敬可爱的长辈；还有胡风、林昭等，都是蒙受过奇冤劫难的人。

心香既燃，最后默默祈祷善良的人们不再蒙受“以革命的名义”降临的大苦大难。

（2007年清明节前后初稿，谷雨后修改，立冬前再稍改）

◇ 一个月以后补充：

本文改就半个月后，为了重新编辑妈妈怀念爸爸的文章，我查看了爸爸“文革”前后的资料。爸爸留下的这批检讨交代文字，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是80年代中期退还家属的。时隔二十多年，妈妈第一次将它交儿女们翻阅。看来这确是珍贵的家藏。它很完整，足有几十万字。我打算倾心倾力，把它编辑成一宗民间史料，让它传家，也传世。

以爸爸的文字，核对我的记忆，他自杀的日子确认了，自杀的直接起因也被证实了：

到了九月九日晚上，当我听到旧省委已经决定对我进行公开的点名批判以后，我觉得真的是一切都已完了，登时眼前一片漆黑。……我接着想到的，就是在明天的报纸上点出了我的名字以后，群众会怎样来对我进行斗争，我害怕这种斗争。特别是在我想到吴天石夫妇是怎样死了的时候，我更害怕。我想：我必须在见报之前逃避这场斗争，否则，我就会受不了。因此，我就在当天晚上采取了自杀行为，来对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爸爸手稿《我的检查》，1969年5月3日）

终于见到爸爸掏心窝子的话。

他的那首绝命诗的文字材料，也看到了。不假，是爸爸的诗，只是不是当夜所作，而是心中“准备”已久，没来得及写进遗书，“遨游”路上，痛苦吟哦罢了。

其余的话，会有机会慢慢说。因为新一轮的祭悼，已经在心中酝酿了。

（2007年岁末）

~~~~~

【研究动态】

##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后记

• 田力为 •

一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席卷无数的普通人，也由此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其深远影响至今未曾断绝。

文革与新中国其他政治运动相区别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存在着一个由民众中间的批判力量自己组织起来的“造反派组织”，这个组织在文革十年期间，始终把批判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权派不便亲自出面或无法调用司法、军队去压制造反派的时候，往往操控或组建反对造反派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去实施压制造反派的各种策略，这样，文革的政治冲突就有了群众组织之间相互对立的外观。这三者的政治博弈形成文革的显著特点。

1967年周恩来在会见武汉造反派头头时，说武汉文革的特点是工人和学生结合得比较好，与北京和上海不同，北京的大学生运动较为突出，而上海的工人运动领先。

除了周恩来指出的武汉文革的这一特点之外，在全国的文革运动中，武汉造反派与反文革派的系列政治博弈，也更具有代表性。在北京和上海的文革运动中，反文革力量特别是保守派1967年初之后就隐而不现了。这两地文革运动，虽然在过去的文革史研究中更受重视，但与全国文革的一般状况有很大不同。

武汉的文革运动，不仅群众运动规模浩大，且文革反对派的力量强大，文革十年间始终在场，还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状况与全国的一般状况更接近。因此，观察武汉的文革运动，对理解全国文革的帮助更大一些。

就全国的文革状况而言，反文革派的力量——反对文革的当权派与保守派的结合——远大于造反派的力量，从而形成了文革运动起落和结局的一般背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及其后的际遇，就是奠基于反文革派的优势力量及其政治策略。

二

1974年3月胡厚民关押审查四年获释后，曾经对人说过：文革将来肯定会被人遗忘。因为了解情况的人不再有机会说话，有机会说话的人都选择说假话。

进入新世纪之后，后文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巨变接近完成，文革提示过的“变修走资”趋势均已成为现实。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重提文革史反而变得更为困难了，胡厚民曾经预言的“健忘症”，真的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了，有关文革的真实历史事实，再也难以获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的历史不重要了。

在亲历文革并为此付出重大牺牲的一些造反派看来，无论是为了过去，还是为了现在和将来，文革历史都不应该被遗忘。

四十多年来，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垄断话语权，封杀关于文革的不同声音，鼓动人们“不纠缠历史旧账”“向前看”；同时投入了巨量的努力，为全社会塑造了一个符合自身利

益需要的文革场景，诸如“道德沦丧”“文化浩劫”“经济崩溃”之类。实际上真实的文革他们自己从来没有遗忘，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冲击、所失去的利益，他们刻骨铭心。所以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冲动把自己的对手称为“文革余孽”，这样就能够建立起“降魔卫道”的道义地位，就获得了俯视对手的高度差。例如某主流经济学名家说自己的辩论对手“是想要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政府某高官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某作家的一部小说，被一些人称为“地主伤痕文学”，她和她的支持者回击说批评者“要搞文革复辟”。这么看来，在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那里，文革依然是活着的，经过他们重塑的文革是他们捍卫权力地位和话语权的最便捷的工具。

在文革史问题上，一方面是高层精英不断在构建一个更加符合自身需要的框架，另外一个方面的去伪存真的努力也日渐鲜明。越是接近暮年，越是有相当多的亲历者被激发起高度的历史自觉，要把自己亲见亲闻的文革史料留给后人。

时间流逝不休，当年深度参加文革的少年和青年，都一步步进入暮年。相当一部分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还没有来得及“回顾当年”写下自己亲见亲闻的事实，就已经作古，很多事情的具体经过就这样湮灭无闻了。因此，写下自己亲见亲闻的文革，就越来越迫切了。

从2007年开始，顾建棠、杨道远、彭勋、柳英发等先后组织过三个写作组。他们搜集文革资料，访谈亲历者，希望能给后人留下一份尽可能真实的武汉文革史实，帮助人们认识那一段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前两个写作组都未能实现目标，一些写作组成员还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这个愿望只能由生者承继下来。目前这本书，是第三个写作组的努力成果。

### 三

2014年12月，杨道远邀约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者多为前两个写作组中年纪稍轻的成员。杨道远建议重新成立写作组，打算在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之际出书。随后写作组数次开会，确定各成员负责的部分，议定各成员拟出的详细提纲，然后分头去写。

2007年前，写作组成员已经在收集文革资料，访谈文革亲历者；至第三个写作组成立前夕，已收集到的文革原始资料做成电子文件数百G，在此基础上编成1964年至1984年的大事记和若干专题的资料长编，整理、编辑并出版了二十多本关于武汉文革的个人回忆录，为这本书的撰写打下了基础。遗憾的是这些资料绝大多数是造反派方面的，而文革是造反派、保守派、当权派三方的政治博弈。

写作组在构建本书框架时，就感到保守派和当权派的材料很难搜集到，因而对这两个重要的文革参与群体无法进行比较全面的呈现。在保守派方面，文革中他们的小报、传单本来就比造反派少得多；文革后许多年的接触中间，他们往往心存种种顾忌，拒绝全面讲述自己的经历。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就对采访者说过“因为涉及到很多干部，所以很多事情不能讲”；六一七武斗死者众多，目击者数千人，作为百万雄师现场总指挥的谢敏华说“没有死一个人”。在当权派方面，虽然出了不少回忆录、文集、传记之类的著作，但讲述文革的真实情况是一大共同忌讳，可资参考的真实材料极少。

再者，文革期间的很多官方文件，不对公众开放；明知武汉图书馆藏有大量文革小报，多方努力不得一见。

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放弃搜集保守派、当权派资料和官方文件的努力，没有放弃获得这类资料的任何一次机会。

我们所搜集到的造反派方面的资料很多，多到写作组每一个人都不敢说看过了其中应该看的所有资料，更谈不上对每一份资料都作过仔细研究。即使这样，这些资料仍有很多方面的缺失。究其原因，除继续搜集为时间、精力所限外，一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或已作古或丧失思维能力，二是造反派骨干和头头迭经抄家，日记、笔记和相关资料片纸无存。

好在写作组成员除田力为外，都是文革亲历者，还有多位始终关注本书写作的亲历者参与讨论、审读书稿。有鉴于此，在这本书里，武汉文革的脉络应该是清晰、连贯的，重要事件不会有大的遗漏；面对海量的原始资料、互相矛盾的记载，写作组成员自会谨慎地作出判断。

第三个写作组成立的最初阶段就明确：

1.本书采取第三人称叙事的客观视角，遣词行文力求不带褒贬色彩，力求真实地反映武汉文革的历史过程，这是我们的初衷和努力方向。由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资料缺乏，也由于写作组成员造反派的历史身份和现实立场，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很难。如果有读者认为这本书是造反派视角的文革叙事，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只能自责努力不够。

2.这本书不是“文革史”。所谓“史”，就是史学著作，除“史实”外，还须有“史论”和“史评”。后两者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做好的。更重要的是，就史实而言，材料的选取、叙事的详略，写作组内尚且存在争论；如果写史，对文革事件和文革人物进行评论并作出结论，意见就更难统一。因此这本书名为“文革纪实”。如果这本书能够起到相对集中地保留史料和史实、给后人了解和研究武汉文革提供方便的作用，写作组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3.“文革纪实”中的“文革”一词，如果理解为“文革时期”，那么严格地说，所“纪”之“实”除了文革运动之外，还应该包括文革时期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这也不是我们的能力、精力所能及的。幸而人们看到书名中的“文革”二字，一般都会理解为“文革运动”，同时为了不使书名累赘，故定下现在的书名。

种种原因使得书稿历经五年才初具规模。一个重要原因是写作组不断地听到各种意见，不断地获得新的资料，从而对已完稿的章节不断地进行修改，正式排版时还在改。

这一本《武汉地区文革纪实》，未能达到全景式的武汉文革史的高度，是一个遗憾。但这本书还是相对完整地呈现出作为文革基本特点之一的造反派组织的状况，及其在各个时期的诉求与行动策略，所始终面对的內部政治整合困境和外部强大反对力量。武汉造反派在文革十年间的不利处境，是反文革优势力量的策略体现，也更符合全国的一般状况。希望这部“纪实”，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回顾那一段政治和历史。

写作组恳切希望读者对本书进行各方面的批评，为本书的完善提供资料。写作组将在合适的时候以电子版的形式发布本书的订正版。

因全书九十余万字（包括插图二百二十余幅），篇幅过大，故不附录文献。武汉地区文革重要文献编成目录附在书后，读者可以此目录为线索自行查阅。

写作组成员分工情况如下：引子：徐海亮，第一章至第七章：杨道远，第八章至第十二章：田力为，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徐海亮，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余德亨，第二十章至第

二十三章：杜良怀，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七章：杜先荣，第二十八章至第三十一章：彭维俊，参考资料：杜先荣，后记：田力为，统稿：余德亨，插图：彭维俊。

本书即将付印之际，写作组衷心感谢以下人士：感谢李晓航、许东杰、吴正祥、刘德光无私地提供大量资料；感谢谢敏华、章迪杰等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柳英发、王光照数度阅读全稿并提出极为详尽的意见；感谢丁家显（原二司头头）、张立国（原新华工头头）、谢邦柱（原新湖大头头）、彭勋（原新湖大头头）、刘玉民（原新华工头头）、曹承义（原新一冶头头）、陈定方（原新华工成员）、张建华（原新华工成员）、杜向东（原红工兵头头）、彭祖龙（原工造总司头头）、谢保安（原武汉三中二司头头）、徐大胜（原武汉制药厂造反派头头）、向旺明（原武汉三中二司成员）、李江（原武汉三中二司成员）、晏胜利（原武测二司成员）、李家沛（原水院二司成员）、胡卫平（原武汉四中二司成员）、岑颖义（原水院二司成员）、刘汉武（原水运工程学院二司头头）、陈昌雄（原工总成员）、李锋（原新一中革司成员）、孟强伟（福建师大教师）、高伐林（独立撰稿人）等以各种方式提供的帮助；特别感谢已经逝去的武汉文革系列回忆录中的几位作者：魏绳武、李承弘、吴恒春、方德纾、徐正全、蒋兆庆、顾建棠、吴焱金、彭祖龙。本书引用了他们的鲜活的回忆。希望本书得以流传，他们就将永远活在这本书里。

2020年3月

□ 来源：《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

【理论研究】

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四）

• 吴 思 •

（上接 z k 2 0 0 4 a）

（五）超极权 2 • 3 版：强行规范 全国山河一片红

1，主要时段和标志性事件

本版时段大体在 1968 年 7 月—1969 年 4 月，从发布“七•三布告”镇压武斗，到中共九大召开。

（1）“七•三布告”和军队镇压

1968 年 7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制止广西武斗，要求立即停止武斗，交回抢去的武器装备。

当时，广西两派动用枪炮武斗数月，援越物资和军队武器被抢。中央将此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授权军方武力镇压，数以万计的造反派被杀。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发出制止陕西武斗的布告，要求所有组织和个人彻底执行“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这两个布告适用于全国，各地武力镇压开始。

（2）工宣队入校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指派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万人，在军代表的指挥下进驻清华大学，制止“井冈山”与“四一四”之间的百日武斗。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派工宣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派工宣队进驻大中小学，制止武斗，搞好斗批改，建立新秩序。

（3）毛泽东警告造反派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听说清华“井冈山”武力抗拒工宣队入校，立即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等人。

毛泽东说，派工宣队制止武斗的命令是他下的。如果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警告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4）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8年9月5日，全国大陆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委会，“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军队干部当主任的20个，接近七成。一年后，又增加到24个。在县级革委会中，军人当主任的达到八成。

超极权体制之所以超越极权，主要在最高领导对社会的更加深入全面的动员和控制。一方面民众也被授权参与控制，另一方面就是政权和社会组织的军事化。全国成为一所大兵营，大兵营又成为一所大学校。

（5）结束刘少奇的政治生命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宣布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全会决定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6）九大秩序

1969年年初，在讨论九大文件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上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

这就是说，超极权三角左边系统的核心组织，在冲垮右翼并建立三结合体制之后，将随造反派组织一起并入新体制：共产党领导下的三结合革委会。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于1966年5月，真正的主事者是江青。毛泽东通过文革小组直接指挥文革。这个小组主要控制媒体，通过报刊社论直接指挥全国运动，通过个人联系授意造反派冲击党政官员。

1966年12月前，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政治局和书记处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1967年1月，中央文革发难打倒了陶铸，书记处停止活动。1967年2月，许多政治局委员参与“二月逆流”，政治局停止活动。

右边的组织系统瘫痪后，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义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68年9月，三结合的革委会在全国建立，左翼系统并入三结合体系，降级版的超极权三角建构完成。

1969年4月1日，九大召开。九大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取代了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

毛泽东认为，召开九大，将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转折点。九大秩序，大体就是他所能建成的新秩序。

2，超极权2·3版的主要特征

（1）民角的权分清单

1.四大。

2.结社自由大幅度压缩。

本阶段，行业 and 单位之外的群众组织被陆续取缔。红卫兵被收编为官办的群众组织，归当地革委会和团委领导。

3.出版自由。

群众组织减少，办报办刊权自然缩减，但尚未彻底取缔。

4.三结合入阁权。

部分群众组织的代表依照三结合原则，经上级批准，进入了革委会。

5.工宣队，贫宣队。

少数政治可靠的工人和农民，拿着原工资或工分，进驻上层建筑，尤其是教育部门，成为管理者。但他们没有干部身份。

工农兵进驻上层建筑，可以看作超极权三角中民角的地位提升，也可以看作官角有了新鲜血液及输送通道。需要强调的是，国营企业工人，与传统的无产阶级不同，他们是体制内的职工，属于政府雇员，和士兵一样位于命令体系低端的某个节点，执行权力机构的命令。工宣队进驻学校之后，往往以军事化的方式管理学校，采用连排班建制，成为全国体制军事化的一部分。

6.取消持枪权及部分革命特权

“七·三”布告后，民间武器被强令收缴。

本阶段之前，武斗虽然没有得到正式许可，通常也不会被官方深究。以武力抗拒官方指令亦然。革命群众实际拥有这两项革命特权。以“七·三布告”为标志，对武斗不再是劝阻或口头警告，而是暴烈的镇压。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为标志，“武力不服从”，作为革命的隐特权，正式宣告取消。官方划定的书面边界和真实边界统一了。

7.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从此,作为解散派性组织、安排就业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综合措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除了符合照顾规定的少数人外,这个运动压缩了中学毕业生的择业空间。

8.群众专政

以群众组织的名义办案,内查外调,限制人身自由。总体看来,超极权2·3版的民角权分大为缩减。

(2) 官角的权分清单

1.军队获得开枪镇压武斗的授权。

2.1968年9月5日,军方主导的三结合式革委会在全国各省建立,“全国山河一片红”。

3.部分“革命干部”复出,官复原职。

4.党团组织重建。革委会中有党的核心小组。

5.抓“五·一六”。

6.清理阶级队伍。

在官方的领导下,“清理阶级队伍”在1968年夏季进入高潮。清理阶级队伍采取群众专政的方式,两派互相揪,揪斗重点从走资派转向各派群众。

造反派在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方面通常不如保守派红,因此造反派遭受了更大的压力。这场运动打击面甚广,据估算,大约三千万人受害,数十万人死亡。〔15〕

7.精简机构并下放干部,并建立了配套的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对应于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干部下放劳动,意味着官角出现了一条走向民间的新通道。干部们在职务和生活方面的权益受损。

(3) 顶角特征

1.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和个人崇拜仍在继续。

2.斗批改。

一再降低超极权版本之后,毛泽东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务。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精简机构,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人农民管理学校,都是斗批改的组成部分,也是逐步完善稳定超极权制度的措施。

(4) 超极权三角之外

超极权三角形圈子之内的主张,大体是毛泽东认可的,可以参与合法互动。圈子之外的主张,则是被镇压的。除了传统的“地富反坏右”之外,这些派别和主张还有:

1.劳动党。亲苏,反对中共左的路线。这是后极权派。

2.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者,例如联动,坚持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可能亲苏。这是极权派。

3.反共救国军。支持台湾国民党。这是威权派。

4.民主党。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

5.一贯道。主要由农民组成，因为对“三年苦日子”不满而进行地下反政府活动。这一派有浓重的传统皇权色彩。

6.还有以反革命罪名抓捕的新主张的代表，例如新思潮、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遇罗克之类表达了阶级贱民的平等主张的思想家。

总之，超极权三角之外还有多种政治主张，但敢于公开表达的都进了监狱。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对此有精彩描述。

7.叛徒特务

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提供了一个处理党内路线分歧的范例。“三自一包”“利润挂帅”等极权或威权主张的拥护者，未必属于敌我矛盾。所以毛泽东说，弄成叛徒才好办，只有叛徒特务才能打倒，永不翻身。

于是，抓叛徒，就成为把不同主张者贬为贱民的常用手段。

3，版本难题

超极权2·3版，大体是军方主导强制建构的三结合革委会版。毛泽东曾经认为，军队没有自己的固定地盘，没有既得利益。现在，军队走上前台，有了自己的固定地盘，会有什么新动向？

大规模夺权之后，新上台的掌权者，无论是军方还是造反派，包括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张春桥，仍旧显示出“脱离群众”的倾向：寻机谋求私利，不愿意被监督，不喜欢别人向自己的权力发起挑战。

如果说，阿克顿所谓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可以称为堕落定律，那么，随着民角的地位下降，挑战监督当权派的风险增加，对权力的制约能力减弱。只要时间足够充裕，新当权派必将在同等程度上堕落。

这种堕落，一方面是超极权向极权的回归，向不受制约或少受制约的方向回归；另一方面，是干部作为公权代理人的品行堕落。超极权2·3版的制约和防范力不足，单靠民众的力量，根本无法抵抗这种堕落和回归。

在民众不可靠的条件下，坚持防修反修，关键在于最高领袖能否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自身使命。于是，接班人问题，就成为决定性的问题。

（六）超极权2·2版：巩固九大秩序 高层左右再分裂

1，主要时段和标志性事件

1969年4月—1971年9月，从中共九大闭幕，到林彪外逃。

（1）维护九大秩序

1970年，全国性的运动是深挖“五·一六”和“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

打击的重点是那些不听话甚至“反复旧”的造反派，包括非议文革的一批思想犯。

（2）庐山会议出事

1970年3月，开始筹备四届人大，确定国家体制并修改宪法。在筹备过程中，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出现分歧。在颂扬毛泽东为天才等问题上，林彪集团成员与张春桥发生争论。

1970年8月，在庐山讨论修改宪法等问题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和林彪集团成员发起对张春桥的攻击，鼓动中央委员们揪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的人。江青带张春桥和姚文元向毛泽东求助，毛泽东下令休会，指责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九大的团结路线。林彪集团成员的会议发言被追查。

在起草九大报告时，陈伯达受林彪委托拿出的版本，就被张春桥和姚文元斥为唯生产力论。周恩来在十大报告中说：“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

除了这种路线分歧，在九大政治局里，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权力争夺和性格冲突不断。

（3）批陈整风

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开始批陈整风，追查陈伯达路线的幕后组织和背景，一路追到林彪头上。同时，毛泽东采用各种组织和人事手段削弱林彪集团。

（4）九·一三事件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家乘飞机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失事。

（5）国际关系变化

1969年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1969年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边防队与苏军冲突失利。苏联大兵压境，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中美联手反苏。

2，超级权2·2版的主要特征

（1）民角权分清单

1.四大。

2.结社自由缩减。

本阶段，限制结社自由的政策比过去执行得更加强硬。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山西两派武斗的布告第八条规定：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对边疆地区的命令规定：“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

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

3.出版自由的缩减。

1969年4月九大之后，群众组织的出版物基本消失。

4.造反派代表的政治地位

群众组织的代表，通过三结合，除了进入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之外，一些著名的造反派在九大上成为中共中央委员，进入了中国政治的最高层。

不过，造反派代表在最高层的政治作用与其地位并不相称。各省市县革委会中的群众组织代表，通常是造反派中的温和派，在本阶段仍然被陆续清除出领导班子。“三结合”被讥为两结合甚至一结合。

（2）官角权分清单

1.深挖“五·一六”和“一打三反”之权。

2.军队系统位高权重。

九大政治局委员21人，军人的比例超过半数。军队系统在政权中的地位，近似文革前刘邓的党政系统。

3.招生招工招兵权。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

由于取消了入学考试，群众推荐权实际由干部掌握，“走后门”上大学成风。决定谁能上大学，成为干部的新增权力。

在工厂招工和知青回城时，干部还有推荐权和批准权。参军当兵，是躲避上山下乡的主要途径。军队干部彼此照顾子女，走后门当兵之风盛行。

走后门是各级各界干部广泛行使的隐权力。

（3）顶角特征

1.个人崇拜降温。

1969年6月，按照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各级党委“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的活动。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发动文革时“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但“现在就不同了，崇拜是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

2.超极权的最高领袖，应该像毛泽东那样维持超极权制度，以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频率提拉左边，清洗走资派，并在经济社会和思想条件成熟时及时提高超极权版本。

但是，九大之后，作为法定的接班人，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显现出极权派色彩，排斥打击文革派。顶角危机显现。

3，版本的降级和难题

对比超极权2·3版，2·2版有如下变化：

（1）中央文革取消；

（2）三结合名存实亡；

（3）革命群众的结社权和出版权基本消失；

（4）官方的特权和隐权力增加；

(5) 个人崇拜降温;

(6) 外交路线由激进转向相对温和, 国际关系格局随之改变。

但是, 最高领导人防修反修的意图还在, “四大”还在, 政治局中的超极权派别还在, 三结合中的造反派代表试图保持或夺回权力, 作为人力资本的造反派还在, 大寨大庆模式还在, 所以, 超极权还能达到 2 · 2 版。

本版的难题在于, 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及整个军人集团显示出极权倾向, 顶角危机和极权复辟危机并存。

(七) 超极权 2 · 2 版的波动: 回潮反回潮 翻案反翻案

1, 主要时段和标志性事件

1971年9月—1976年9月, 从林彪集团覆灭, 到毛泽东去世。

(1) 1971年9月13日, 林彪和家人外逃, 林彪集团主要成员被隔离审查, 林彪集团覆灭。

(2) 1971年10月, 中国联合国席位恢复。1972年2月, 尼克松访华。外交格局大变, 威权道路进入可选范围。

(3) 1972年, 周恩来批极左, 被称为“右倾回潮”。

(4) 1974年, 批林批孔运动。

(5) 1975年, 邓小平整顿。

(6) 1976年,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7)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去世。

2, 超极权 2 · 2 版的四次波动

(1) 右倾回潮: 超极权 2 · 2 弱化版 (1972年)

1. 1972年8月, 周恩来批林彪的极左思潮: 空洞、极端、形式主义, 空喊政治挂帅。随后, 《人民日报》批极左, 批无政府主义, 意识形态出现调整迹象。

2. 1972年12月, 毛泽东要求少批极左, 说林彪是极右。张春桥等鼓动“反右倾回潮”。随后, 文革派控制下的全国报刊纷纷批极右。但是, 周恩来控制下的政府和经济工作坚持纠左——整顿经济, 恢复生产和教学秩序。

无论是军人集团, 还是复出的老干部, 主持日常工作的通常偏向极权秩序。江青集团主导意识形态, 批判监督, 偏向超极权秩序。这种意识形态偏向超极权、日常工作偏向极权的格局, 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3. 二月逆流平反, 邓小平陈云等一批老干部恢复工作。人事和干部政策向极权阵营倾斜。

4. 1972年8月, 中共中央撤销“三支两军”: 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 在党委建立后, 军管即可撤销。

在军管时期, 在许多地方的革委会内部, 造反派代表已被清除。取消军管后, 党政干部独大的格局基本恢复。

5. 中美关系缓和。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恢复了中断25年的中美关系。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又和许多“第二世界”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正是毛泽东曾经批判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

6.大规模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持续到1972年。

（2）批林批孔：超极权 2·4 版（1974 年）

1.批周恩来修正主义。

1973年年底，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和美国谈判时不够强硬，要求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和叶剑英的修正主义路线。江青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做了“上纲很高”的检讨。

2.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各地受压多年的造反派一跃而起，动用“四大”武器，借机争取平反，反击军人政权以清理“五·一六”和“一打三反”之名对造反派的迫害。

造反派的行动得到中央超极权派的鼓动和支持。他们把批林批孔运动看作保卫文化大革命，看作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看作对全国范围的右倾回潮的反击。江青集团以评法批儒之名，批党内大儒，批中庸之道，剑指周恩来。

3.批走后门。

九大之后，军队干部和其他掌权者，普遍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友安排参军、入学，“走后门”成风。江青公开点名叶剑英“开后门”，文革派发起批走后门运动，造反派在基层响应。一个月后毛泽东叫停，说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4.跨行业的串联再次出现。部分地区已被解散的群众组织再度恢复，还成立了一些新的群众组织。

5.民间出版物再度出现。

6.揪斗干部等革命特权一度在部分地区恢复使用。

7.些已经被清除出局的造反派代表得到平反，释放出狱后，重新入阁。

8.批林批孔运动的限制。

批林批孔运动持续半年多之后就转入低潮。

1974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文件不许革命群众揪回已经返回部队的“支左”人员，这些人的错误由部队处理。

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指出生产形势严峻，要求造反派群众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不准抓人打人。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这一年，造反派宣称“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3%，远低于平时。

总之，超极权三角中衰落的左翼再次得到提振，上下互动，冲击右翼。从“四大”的应用水平、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革命特权和入阁权等项民角权分短暂收复失地的尺度看，批林批孔运动在部分地区一度达到超极权2·4版的水平。

但是，此时的民众动员大大低于1967年7月—1968年7月间的水平。

官方也吸取了经验教训。按照超极权三角结构对自身角色的规定，他们口头上紧跟运动，主动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见造反派代表，妥协让步，实在不行就躲避或软磨，尽量避免正面对抗。

左翼的组织体系、动员模式、人力资本，“四大”等结构性权利，再次发挥作用。比起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动力，少了理想，多了平反和报复动机。

如果把批林批孔运动看作第二次文革，看作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超极权结构的动态展现，我们可以看到，在超极权2·2版的结构中，各方手段大体确定，冲击的边界大体确定，彼此预期大体确定，因此冲突的烈度降低。

（3）全面整顿：超极权2·2弱化版（1975年）

1975年的超极权三角，右边搞整顿，实际工作瞄准四化，极权化倾向明显；左边在务虚，大肆宣传更加深刻成熟的超极权理论，反修防复辟。

1.邓小平全面整顿。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提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文革以来，这是第一次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国性工作目标。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学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进行全面整顿：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商业、整顿军队、整顿科技、整顿教育、整顿文艺等。经过半年多全面整顿，打击了一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造反派首领，调整了一些领导班子，生产秩序有所好转。

讲国民经济而不讲路线，这是从超极权向极权甚至威权方向的转化。一旦经济发展成为中心，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必将发生全面调整。

2.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1974年10月，毛泽东会见一位欧洲国家首脑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张春桥和姚文元选编了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1975年2月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他们二人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当年三四月份先后发表。全国学习讨论，深入到工厂农村。

1949年前，中国是威权社会，毛泽东说和资本主义差不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所有制变更了，威权社会成为极权社会。但极权社会和威权社会一样，保留了商品经济和工资制度，即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可以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毛泽东无法立刻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但要加以限制。

是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可以看作超极权路线与极权路线的区别。是否消灭私有制，可以看作极权路线与威权路线的区别。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达到了新的精度和高度。

（4）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超极权2·3版（1976年）

1.评水浒。

1975年8月，毛泽东评《水浒》，说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全国报刊随即掀起评《水浒》浪潮，批判宋江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

作为一种左翼动员模式，评《水浒》近似文革初期的评《海瑞罢官》。

2.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毛泽东发令，江青集团再次吹响了左翼的集结号。

按照惯例，各地蛰伏的左翼开始民间串联，行使“四大”权利，要求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并为他们平反，被赶出领导班子的三结合造反派代表要求重新入阁。一些省份的造反派还重新使用革命特权，冲击省委，揪斗追随邓小平的“复辟派”和“还乡团”。一批追随邓小平整顿的老干部下台。

3.毛泽东对运动的要求和限制。

毛泽东说：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这种要求的水平，大体相当于1968年7月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之后的超极权2·3版。

3，顶角的变化和难题

（1）寻找接班人

超极权三角，是毛泽东试图建立的独特政治模式。这个模式的关键在于：最高领袖定期调整左右两翼，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时发展经济，交替前行，走向共产主义。

迫在眉睫的难题是：毛泽东年老多病，谁能撑起这个顶角？

1.九大指定林彪为接班人，但林彪集团容不下江青集团和造反派。

2.江青、张春桥或王洪文，很难被军方接受，与党政系统关系紧张。

3.邓小平强硬反苏反修，党政军认可，似乎有望接班。但他在整顿中与左翼闹僵，被江青集团斥为复辟翻案。

4.1976年四五事件，民众大规模自发悼念周恩来，表达了对超极权左翼势力的不满。毛泽东认可镇压，随即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指定权威不足但左右两边都能接受的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2）超极权理论升级

1.197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会上印发了1966年7月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1973年8月，十大报告肯定了九大路线，肯定了文革必要和及时，但比九大更强调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宣称这样的革命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有权对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

超极权三角由此获得了时间维度，并在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付诸实践。

2.1974年10月，毛泽东讨论了所有制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与变化，确定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任务，并要求全中国学习这种理论。

3.1976年3月，在批邓运动中，中共中央发布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毛泽东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有关要点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根基深厚，到处冒头，他无法根除，不能不让步。他的超极权根基不稳，极权的根基也不稳。在民间和官场的根基全面不稳。这是他对超极权运动的来龙去脉及结果的总结。

（八）超极权三角解体

1，顶角坍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超极权三角的顶角塌陷。华国锋的个人权威还不如左右两翼的部下。如果江青集团爱护华国锋坚持左翼理想和政策，如果党政军老干部辅佐华国锋维持秩序发展经济，如果个人崇拜运动提升了华国锋的威望，三条兼备，也许可以共同撑起一个顶角。

2，清洗左翼超极权势力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与右边联手粉碎“四人帮”，随即宣告文革结束。

左翼高层入狱后，“三种人”遭到清洗，中下层造反派的人力资本被扫荡一空。超极权的三角结构退至极权的三层结构。

个人崇拜运动失败后，极权2·0版的三层结构，继续向集体领导的双层结构塌陷，中国进入后极权时代，可以看作极权1·8版。

“四大”一度在西单墙上发挥了对右翼有利的政治作用。最高权力层更替后，西单墙被取缔，“四大”在修改宪法时被取缔。

3，趋向右翼威权

1975年初，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提出四化目标，得到民间广泛的拥护。

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民众大规模自发悼念，再次表达了对发展经济维护秩序的温和路线的支持。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后解放思想，淡化意识形态，放弃大寨红旗，恢复物质刺激，实施三自一包，推行三和一少，后极权社会来临。

再往后，个体户诞生，民营企业发展，市场经济壮大，接受国际规则并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后极权社会逐步向威权社会转化。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已经成为半极权半威权社会。如果把1·8版定为威权与后极权的分界线，十八大前夕的中国，大概的位置是半威权半极权的1·4版。

（九）超极权建构失败的主要原因

文革为什么不能成功？

超极权经济，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大庆模式，难以调动工人农民积极性，效率低下，导致了全面贫困。这种模式比不过极权经济的物质刺激原则，更比不过威权经济的个体农户、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退向极权和威权，经济利益巨大。

超极权政治，扩大了民众政治权分。但是，第一，只许用来监督官员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用于追求三自一包和自身福利。第二，虽然可以批评官员的特权和不良作风，但招致报复的风险很大，用途有限。第三，新增的少许政治权利和革命特权，提高了冲突的概率，既让官员受损，也让群众相害。

总之，文革中的权分调整，扣除民众的些微所得之后，大局是干部民众双双受损。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要问题——权利贫困和经济贫穷——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权分调整过程又激化了各种人事矛盾。

在理论上，把损失变成收益的办法只有一个：斗私批修，改造人性，转变人们价值观。但这条路也走不通。

毛泽东想解决极权体制的脱离群众问题，但超极权比极权更加脱离群众，同时也脱离了官僚。双脱离，双受害，超极权体制的根基比极权体制更加脆弱，于是人亡政息。

超极权试验，冲上了人类社会一元化秩序的最高峰，专制秩序的版本升级潜力至此穷尽。

（未完待续）

□ 来源：《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四）》，美国华忆出版社，2019年11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